二戰後奇美部落的秀姑巒溪船運：基礎設施的本體論與技術政治

吳明季*

摘要

二戰後至 1980 年代中期，正值台灣經濟發展轉型的年代，奇美部落出現了一種很特別的秀姑巒溪船運基礎設施。這種船運基礎設施，涉及以原住民價值系統為社會性基礎設施來形成系統性的運作；但同時，此基礎設施又在更大的尺度上為組織資本主義市場和國家治理服務。

本文以技術政治（technopolitics）分析和歷史民族誌，辨識此基礎設施有兩種不同的價值系統作用其上，亦即原住民價值系統和資本主義體制。這兩種不同本體論的價值系統，如何在不同尺度、以何種方式透過此基礎設施系統性的運作、交纏、滲透、連結與碰撞。

值得注意的是，秀姑巒溪船運基礎設施的運作同時受到多個權力佈局的影響。基礎設施的技術政治造成權力的滲透、交纏與影響是錯綜複雜的。基礎設施的技術物質運作，會被不同的行動者（包含人與非人）為了多重且往往是相反的目的而挪用或抵制，結果從來不是能夠預先設定的。重點在於基礎設施如何與某種（或多種）權力佈局形成客觀的連結，而達成治理生命的權力佈局效果。而這些不同的權力佈局，又會如何持續的角力、糾纏、磨合與相互作用，造成新的權力佈局效果與變化。

關鍵詞：原住民價值系統、本體論、基礎設施、技術政治、秀姑巒溪船運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國立屏東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專案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壹、前言
貳、基礎設施的系統性運作與權力佈局效果
參、苦苦追趕：戰後奇美部落族人的發展轉型經驗
肆、讓原住民價值系統不可見的技術政治
伍、挪用軍隊與資本家船運技術的原住民價值系統
陸、結論

壹、前言

二戰過後至 1980 年代中期，花蓮秀姑巒溪出現了一種木船拉縴載運貨物和人員的船運方式。這種船運方式其實並不新，早在 1870 年代中後期，清國的軍隊在水尾（今瑞穗富源一帶）駐軍，就使用這種船運方式在秀姑巒溪載運糧餉與兵員[1]。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在台灣發展製糖工業，1921 年新式工業糖廠「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花蓮港製糖所大和工場[2]」在光復正式運轉。日本資本家也在秀姑巒溪使用這種船運方式，來收購載運奇美部落族人種植的甘蔗[3]。但二戰後比較特別的是，此時這種船運方式是由奇美部落族人每年推舉出一位負責管理船隻的船長，以家族 Mipaliw（換工）和部落自治管理的方式來運行。船隻被高度維護和運作得很好，因為全部落只共有這一艘船，可以說是當時奇美部落族人載運貨物和人員流通的基礎設施。奇美部落族人以自身的價值系統——包括促進交換和勞動的法則，以及包含倫理的榮譽法則[4]——高度自治運作和管理著這艘船。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1] 依據李宜憲的研究，1877 年清軍因政策調整轉紮後山中路，軍營部屬主要在花東縱谷璞石閣、水尾一帶。然而糧食、後勤補給依賴海運，需要找尋一條具運輸機能的河道將物資從海邊運往縱谷，幾經找尋最後確定秀姑巒溪及其出海口（大港口）是最適合的河道與港口。當時的海運依靠帆船，至大港口海面停輪轉搭小船進入秀姑巒溪逆流而上，載運糧餉與換防兵員至花東縱谷。外來軍隊大量進入與駐紮秀姑巒溪沿線阿美族部落，造成對既有勢力與土地資源衝擊，最後引發大港口事件。相關內容可見李宜憲，〈晚清國家體制與原住民部落的衝突：從烏漏社到阿棉山社〉，收錄於蔡中涵編，《大港口事件論文集》（花蓮：台灣原住民教授學會，2008），1–32。李宜憲、莊雅仲，《大港口事件》，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四)，（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

[2] 今台糖公司花蓮糖廠，亦常被稱為光復糖廠。

[3] 吳明季，〈日治與清國時期的秀姑巒溪船運〉，《原住民族文獻》第 52 期（2022 年 9 月），94-97。

[4] 吳明季，《價值、參與和主權：台灣原住民部落發展實踐的三個面向》（花蓮：國立

船隻是奇美部落族人透過民選村長跟瑞穗鄉公所爭取的。奇美部落聯外道路 1986 年之後才可單線通車，在那之前只能依靠步行。當時的蜿蜒山徑，時而下切河谷走河床，時而穿過森林小徑，還要走過族人自己在懸崖峭壁邊開鑿出來的僅兩個合併手掌寬度的步道。族人面臨政府「田賦徵實」政策以穀物實物納稅，用人力每趟搬運一包 60 公斤的稻穀，走三、四個小時的山路到最近的城鎮瑞穗繳稅，實在太過辛苦。瑞穗鄉公所買了船隻，交由奇美部落以自己的方式來運作，因為鄉公所也沒有能力經營管理這艘船。很奇特的，奇美部落的秀姑巒溪船運景觀，形成二戰後至 1980 年代中期，奇美部落族人運用跟政府爭取來的船隻，挪用了清國軍隊與日治時期資本家的秀姑巒溪船運技術，以自己原住民的價值系統來運作，參與進台灣經濟發展轉型的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過程中有兩種不同的「價值系統」[5]或「構成世界的方式」（worlding）[6]的邏輯與相關行動者在系統性的運作、交纏、連結與碰撞。本文透過二戰後奇美部落秀姑巒溪船運，一方面辨識不同本體論的價值系統如何在不同的尺度、以何種方式運作，這是重新劃界（reterritorialization）的工作。另一方面關注秀姑巒溪船運基礎設施發揮的物質性效應，以及其與原住民價值系統、國家主權和資本主義的客觀連結和交互作用，所產生複雜的「權力佈局」效果。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貳、基礎設施的系統性運作與權力佈局效果

基礎設施是建造網絡，促進貨物、人或想法的流動，並允許它們越過空間進行交流。人們往往很容易關注到基礎設施的物質形式，亦即鐵路、公路、水、電、機場、下水道、通訊……等硬體基礎設施。然而，硬體基礎設施要能夠順利運行的前提，是需要系統性、網絡性的運轉。例如，水龍頭不是只有管道而已，電腦也不是只有電線和光纖電纜而已。基礎設施正如 Brian Lakin 所指出具有雙重性。首先是物質性，基礎設施是能夠移動其他物體的物體，且此物質性會對更大尺度的社會制度與政治進程產生影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論文，2022）。

[5] David Graeber, *Toward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The False Coin of Our Own Dreams* (Springer, 2001).

[6] Philippe Descola, “Modes of Being and Forms of Predication.”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4, no. 1 (Summer 2014.): 271–80.

響。其次是系統性，能夠順利讓基礎設施順利運作的包括背後的制度框架、法規、政策、教育、科技、文化……等，本文稱之為「軟體基礎設施」或「社會性基礎設施」；基礎設施能夠運作都是靠系統性的運轉。[7]

基礎設施的技術政治（technopolitics）在歷史上如何與特定的權力佈局連結，是當今最具活力的人類學研究之一。相對於「被……治理」，基礎設施是一種「受……轄制」的治理技術，這種治理方式在今日已經成為主流。這種方式在歷史上經常都跟特定的權力佈局相結合，形成「權力的裝備」。Foucault 分析當代的權力形式與治理技術，已經不是君主權力的治理方式，而是包含規訓權力（disciplinary power）和生命權力（biopower）的治理模式。規訓權力透過時間、空間秩序的建立、層級監視、規範化裁決和審查，使個體成為規訓的身體。生命權力則透過人口統計、疫苗施打、基礎設施……等，對個體和群體的生命加以管理。「權力的裝備」會協助規訓個體或是管理生命，透過規範來發揮作用，使主體內化，來調節或控制生命。是佈局主導了眾多使用基礎設施的主體，權力透過滲透來支配。這種效力造成權力的匿名性，讓被治理者感受不到自己是透過基礎設施的生命政治被安放在治理圖式裡，反而會以為是自己主動投入[8]。某個基礎設施的興建與運作，可能同時受到多個權力佈局的影響。基礎設施的技術政治造成權力的滲透與影響是錯綜複雜的。基礎設施的技術物質運作，會被不同的行動者（包含人與非人）為了多重且往往是相反的目的而挪用或抵制，結果從來不是預先確定的[9]。重點在於基礎設施如何與某種（或多種）權力佈局形成客觀的連結，而達成治理生命的權力佈局效果。要關注這些權力關係如何在基礎設施中具體化，以及社會技術網絡為了運轉基礎設施，如何產生特定形式的「環境性」。基礎設施並不決定具體的行動方針，而是透過改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7] Brian Larki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 no.3 (August 2013): 327–343；林文玲，〈基礎設施研究：前言〉，《臺灣人類學刊》第 15 卷第 2 期（2017 年 12 月），1–6。

[8] 布洛薩（Alain Brossat），《遭撞翻的哲學家：哲學評論集》（Le Philosophe Renversé: Et Autres Essais）謝承叡、韓旻奇、羅惠珍譯（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1[2019]）。

[9] 參見 Ashley Carse, *Beyond the Big Ditch: Politics, Ecology, and Infrastructure at the Panama Canal* (Cambridge : The MIT Press, 2014); Emiliano, Treré , and Alejandro Barranquero Carretero, “Tracing the Roots of Technopolitics: Towards a North-South Dialogue,” in *Networks, Movements and Techno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Critical Analysis and Current Challenges*, ed. Francisco Sierra Caballero and Tommaso Gravante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8.), 43–63.

變（建構成的）環境來修改社會運作的「可能性領域」[10]。

如果不考慮基礎設施對現代生活日益增長的重要性，就無法理解現代生命政治。隨著空間的工業化，生命不再是文化、社會、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而是反過來依賴技術發展[11]。許多研究注意到，基礎設施網絡如何成為現代國家早期管理其整個領土的先決條件，以便能夠實際到達並有效統治。透過控制基礎設施網絡，國家不僅獲得了對其領土的權力，而且獲得了對其人口的生命權力[12]。

然而在本文，很特別的涉及一種以原住民價值系統為社會性基礎設施，來形成系統性運作的基礎設施；但此基礎設施同時又在更大的尺度上為組織市場和國家治理服務。這種基礎設施是如何形成的？作用在此基礎設施上的數種不同權力佈局，如何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進行競逐、角力、複雜的交纏與交互作用？這些複雜的權力佈局交纏與碰撞，又是如何影響人們的慾望？以及對可能性的感受？在接下來三節，我將透過民族誌田野與相關文獻爬梳繼續探討。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叁、苦苦追趕：戰後奇美部落族人的發展轉型經驗

21 世紀奇美部落族人開始推動文化復振與社區營造，2007 年曾與卑南族藝術家陳冠年合作，以馬賽克壁畫呈現奇美部落拉船的歷史（見圖 1、圖 2）。壁畫旁的一段文字，是奇美部落文化發展協會撰寫：

> **拉船到瑞穗**
>
> 逆著陡峭壯闊的秀姑巒溪，從奇美拉船到瑞穗，是一段辛苦而危險的過程。

---

[10] 參見布洛薩（Alain Brossat）著；莊浚生譯，〈裝備將是集體與否？〉（Les Équipements Seront Collectifs Ou Ne Seront Pas），《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30 卷第 2 期，（2020[2019]年 6），149–58。Andrés Luque-Ayala and Simon Marvin. “The Maintenance of Urban Circulation: An Operational Logic of Infrastructural Control.”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 Space* 34 no. 2 (April 2016): 191–208.

[11] Andreas Folkers, “Existential Provisions: The Technopolitics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 Space* 35 no. 5 (Octobor 2017): 855–74.

[12] 參見 Michael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5 no. 2 (November 1984): 185–213. Chandra Mukerji, “The Territorial State as a Figured World of Power: Strategics, Logistics, and Impersonal Rule.” *Sociological Theory* 28 no. 4 (November 2010): 402–24.

為的是將部落種的農作物運到瑞穗去賣，並從瑞穗帶回日用品，養活一家大小的溫飽。因為座落在山間的奇美交通不便，部落聯外的瑞港公路，一直到 1986 年才開通。

幾個家族說好，用互助與 Mipaliw 換工的方式，一起拉船載運農作物到瑞穗。後方掌舵的是經驗老到的船長，指揮號令著一切。前方撐船的副船長必須要很機靈，當船遇淺灘時要下來抬船頭。拉船的部落族人怕將衣服弄溼，脫光了衣服使盡力氣還是汗如雨下。在那個物資貧困的年代，族人們奮力與生存搏鬥，對於裸露的身體，並不會存有異樣的眼光。族人在乎的是，小心不要翻船，家族辛苦務農的血汗付諸東流。

大船只有一艘，是整個部落共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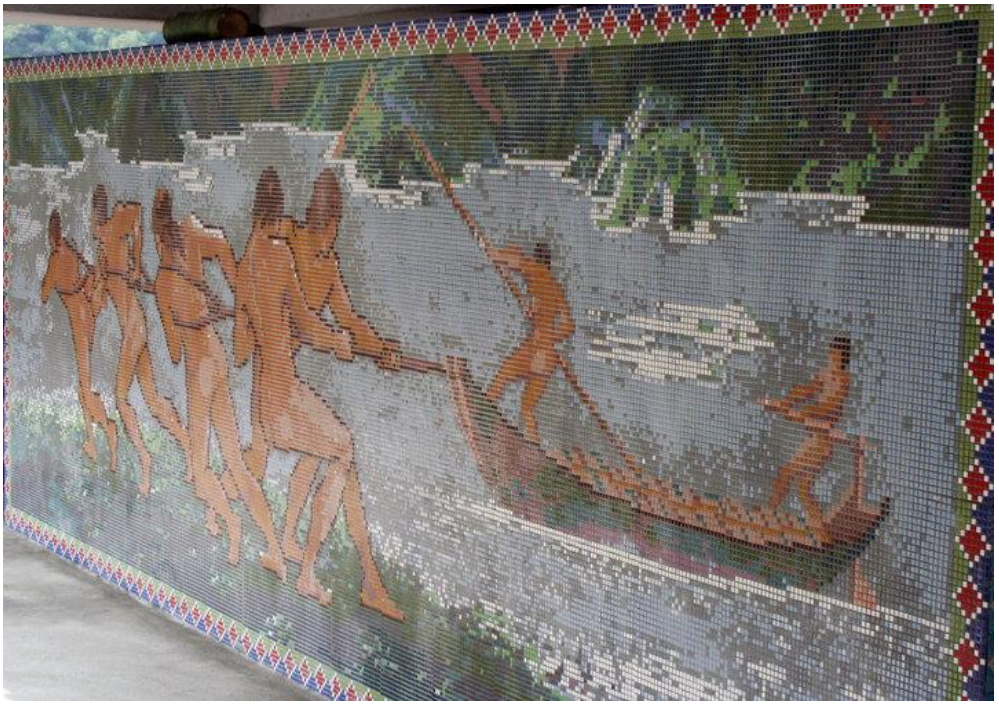

圖 1：用馬賽克壁畫呈現奇美部落拉船到瑞穗的情形。

資料來源：吳明季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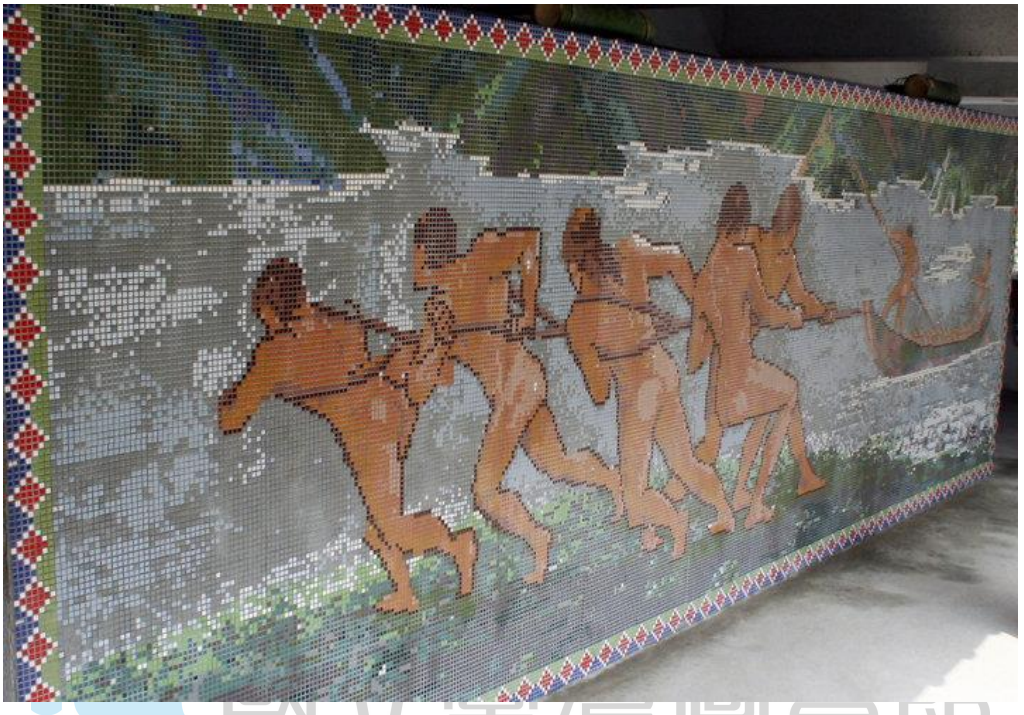

圖 2：在岸邊拉船的有五個人，船上是船長和副船長，共七人。

資料來源：吳明季拍攝。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奇美部落族人在秀姑巒溪拉船的年代，正值台灣邁入工業化經濟起飛的年代，台灣農業也逐步整併入全球資本的分工架構當中。台灣在 1950-60 年代因應地緣政治格局的影響，抓住了搭上「跟進型」工業化的班車，亦即隨著全球傳統產業追隨低工資與低環境成本的區域轉移，經濟快速發展[13]。資本主義不均衡地理發展的現象，正如 David Harvey（2005）所指出，無論在全球或一個國家之內都會發生，某些地區的發展導致其代價由其他地區承擔[14]。對東台灣乃至奇美部落的影響，誠如夏黎明、林玉茹和

[13] 見 Richard E Barrett and Martin King Whyte, "Dependency Theory and Taiwan: Analysis of a Deviant Cas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no. 5 (1982): 1064–89. 以及 Chih-Ming Ka and Mark Selden, "Original Accumulation, Equity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s of Socialist China and Capitalist Taiwan." *World Development* 14 no. 10 (1986): 1293–1310.

[14] David Harvey. 2005. *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5).

黃宣衛所指出，戰後台灣經濟發展形成「發展型國家的內部依賴結構」，讓「台灣東部徹底的邊緣化」[15]。奇美部落成為族人嘴裡說的：「什麼都比人家慢，整整慢了二、三十年」。奇美部落直到 1964 年才有電、1986 年部落聯外道路才開通、1992 年才有電話、2011 年才有簡易自來水。1980 年代，奇美部落族人還普遍住在茅草家屋當中。當時，奇美部落還沒有市內電話，全村只有一個手搖式、需要接線生轉接的電話，放在村長開的雜貨店裡。在台北工作的年輕人匯錢回家，會打電話（透過接線生）通知父母。村長廣播後，族人會跑到一個叫「萬歲」的懸崖高處，呼喊在秀姑巒溪對岸田園工作的父母。父母會跑步、游泳渡河趕到手搖式電話旁邊等孩子的第二通電話。

歷史上台灣資本主義創造的「好處」，或發展敘事編織和實踐的願景，奇美部落族人的感受是：明顯被丟在後頭、跟不上、苦苦追趕。日治時期 1920-30 年代和民國時期 1950-70 年代兩次台灣農村綠色革命，奇美部落明顯被落在一旁，或者被放棄的。第一次綠色革命是 1920 年代日本殖民政府開始在台灣進行一波水圳現代化的興建和稻米品種(蓬萊米)的研發，肇因於 1918 年日本發生非常劇烈的米騷動事件[16]，幾乎動搖日本國本。日本政府痛定思痛要讓殖民地台灣和朝鮮的稻米生產納入日本帝國糧食體制，在台灣透過各種政策啟動了一波綠色革命增加糧食生產，包括蓬萊米品種的研發、化學肥料的使用、水圳基礎設施的興建、擴建或現代化改善.....等等[17]。第二次綠色革命是在 1950 年代冷戰情勢下，由美援挹注的農復會

國家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15] 夏黎明、林玉茹、黃宣衛，〈國家內部次區域發展：東台灣的論述與經驗〉，收錄於簡旭伸、王振寰編，《發展研究與當代臺灣社會》（高雄：巨流，2016），102。

[16] 1918 年日本發生著名的米騷動事件，幾乎動搖日本國本，日本政府才發現不能太依賴東南亞國家的低價糧食進口。因為當時東南亞國家幾乎都是歐洲國家的殖民地，容易受到歐洲殖民列強的影響。彼時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加上東南亞國家接連發生天災（洪水或乾旱）導致稻米產量不足，歐洲殖民政權接連在 1918-1920 年禁止稻米出口，以儲備稻米供國內消費或戰爭需求。消息傳到日本，瞬間引發日本稻米市場的恐慌和投機。許多米商預料接下來日本會有米荒，於是囤貨稻穀想等米價飆高時再售出，造成許多日本窮人無米可買，進而引發暴動。

[17] 參閱 Huahsuan Chu, “Tropicalizing Taiwan: The Environment, Crop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Japaness Colonial Food Regime, 1895-1945.”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Graduate School of Binghamton University, 2020). 張家綸、康芸甯、林佩欣，〈大圳誕生之前的故事〉，收錄於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編，《圳流百年：嘉南大圳的過去與未來 真正改變臺灣這塊土地的現在進行式》（台北：方寸文創，2020），33–53。

（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結合隨國民黨來台的外省技術官僚，推動台灣土地改革與改良農業的各方面工作，除了技術革新外更涵蓋制度改革。戰後高速成長的農業經濟，擔負著台灣出口外匯與之後扶植工業化的角色，以科學改良品種為基礎，搭配農藥、化肥的使用，以及農業機械化與水利灌溉等設施，加上管理技術的興起，帶動了一波綠色革命[18]。然而奇美部落顯然是沒有搭上這兩波綠色革命的「好處」，反而是在台灣整體經濟發展的外溢效應（Spillover Effect）下，過了很久之後才不得不開始一路苦苦追趕。

戰後奇美部落族人的發展轉型經驗，除了跟不上、一路苦苦追趕，還包括許多「被騙」的故事。由於我在奇美部落的在地人類學家與長期行動主義者角色，當部落的老人家把我認定是「自己人」（部落的局內人）之後，會私底下告訴（告誡）我，要小心部落中少數的幾戶漢人——他們多是日治時期遷移來奇美的腦丁（採樟戶），大多是客家人。儘管部落生活表面上原漢關係一團和氣，然而阿美族人記得很清楚，過往因為高利貸被這些漢人「騙」走土地的太多案例。在我的田野中常常聽到「兩包花生就被騙走一塊地」的私下談論故事。為什麼兩包花生就會被騙一塊地？那是怎麼一回事？「就是不會算啊。原住民不會算。所以人家（漢人）說，你今天借的錢多少，以後你（農作物）收穫的時候（還）多少。你用你收貨的錢來還你借的錢這樣。結果呢？很笨啊那個原住民。你借的一包（花生種子或稻穀）就變兩包。結果他們（漢人）說，誒，太慢了，還要還利息啊。就這樣啊。如果你今年沒有還的時候，你（債務）加倍了啊。」「母錢加那個利息，還要再算利息啊，加在一起不夠那個你還的，你明年還（要）再還，又加利息啊。」「就是借了那個錢，（債主）就把利息一起漲高啊，就沒辦法還啊。」「東加西加，原住民也搞不清楚啊，借兩包花生（做為播種的種子）而已，居然要用一塊地來還。」「就是不會算啊。人家（漢人）說那樣那樣還，多少多少，利息又加利息。」廖運潘記錄了 1950 年代台灣民間黑市貸款年利率高達 30%以上，戰後初期地下錢莊吸收資金的日利高達 2%，亦即存 100 萬元一個月後連本帶利 160 萬元，兩個月後變成 256 萬元[19]。

國家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18] 見瞿宛文，《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2017）。鍾怡婷，〈農村：現代性未竟之處？還是社會創新的苗床？〉，《巷仔口社會學》。（台灣社會學會，2019，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9/03/26/chungyiting/ 取用日期：2022 年 7 月 28 日）。

[19] 廖運潘，《茶金歲月：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

看來奇美部落客家人放貸給阿美族人類似於地下錢莊的複利計算[20]。客家人借高利貸給原住民時會簽下具國家法律效用的借據，日後原住民沒錢還債，就用國家和法院的力量，逼迫原住民用土地償還。

欠了高利貸債務導致流失土地，許多奇美部落阿美族人會產生一種強烈羞愧感。一方面是自責祖先辛苦開墾的土地怎麼會從自己（或家族親戚）手上流失，另一方面是阿美族價值系統的交換倫理很注重「還」這件事，不要說欠債，就算是收受日常禮物或恩惠欠一些小的人情，都是要還的。許多阿美族人不明所以，認為自己也是勤勤懇懇，怎知會欠下債務導致祖先的土地被債主拿走，導致羞愧萬分。許多奇美部落族人會感慨萬分的說：「**以前是命很困難啊。**」然而，事實上這並不是命的問題，這是經濟制度強制轉變形成壓迫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制度會幫助阿美族人更深陷債務泥淖。在我的田野當中，許多奇美部落族人提及收到遲繳稅金的法院通知，只好去跟客家人借錢，走三個小時的山路到瑞穗，然後坐火車到花蓮的法院出庭、補繳稅，結果又陷入債務循環。族人所說的一年兩次繳稅，是指二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每年兩期對農民的田賦徵實，而這與政府擠壓農村剩餘扶植工業發展的政策有關。法院執行質權法的角色也會剝奪原住民對土地權利的主張，阿美族人原有的土地、財產觀念在法院是被否決的，法院的判決使得阿美族人土地、財產流失，又陷入債務泥淖。

原住民在資本主義化的過程裡是被什麼困住？在 21 世紀的今日，奇美部落族人 Olo’h Komud 綜合許多奇美部落老一輩族人「被騙」的經驗，以一個反思的眼光，言簡意賅的告訴我，原住民是被「經濟」和「知識」困住。「經濟」指的是這一百多年來強制將台灣原住民捲入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知識」不一定指現代學校知識，而是指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裡，原住民要能看懂別人在玩什麼，否則經濟模式和遊戲規則永遠都是別人在掌控，原住民只能被宰制。在這一百多年間，絕大多數奇美部落族人對於 Olo’h Komud 所說的經濟和知識確實是「一團迷霧」（奇美部落族人用語），然而這套新的經濟制度切身宰制原住民的生存。奇美部落族人吃過虧後並不想被動任其擺佈，而是想要主動參與其中——以其自身理解的方式和自

2021）。

[20] 為什麼奇美部落族人明知道跟這些漢人借錢利息那麼高，還是要跟他們借錢？「就是沒辦法，沒有地方借啊。很少人有錢的，以前。」台灣金融機構的貸款門檻對奇美部落族人而言常常難以企及。儲蓄互助社是 1970 年代才透過天主教會引介奇美部落族人加入，宣導儲蓄觀念與金融互助，以減少高利貸的危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身所能依侍的條件。但 Olo'h Komud 指出：「因為我們（原住民）是善良的，我們的（交換）文化是講誠信的，是你給我好處、你願意幫我，所以我願意幫你的那種概念。可是在（資本主義）商業機制裡面他們（商人）就會操作這個東西(指操作原住民的善良)。」本身擔任記者的 Olo'h Komud 看了太多行口老闆、糧商運用先給原住民資金買苗、整地、買肥料農藥等「訂金」,類似放貸的概念,讓原住民個別進入其產銷系統,當中剝削極大。「可是你（原住民）又還要感謝。甚至於說我的老闆、我的老闆對我怎麼樣。你懂意思嗎？就是說，我們（原住民）的善良會被奴化。」

戰後奇美部落的阿美族人儘管在發展體制中處於不利位置，常被剝削且吃了很多虧，但他們是渴望並強烈信奉發展轉型，並且主動參與其中。很多族人認為過往的生活過於艱辛,他們渴望有更好的醫療、更好的住房、更好的物質生活、給小孩子更好的教育以擺脫苦日子。「有錢才有尊嚴」、「沒有用的年輕人才會留在部落，不到都市去工作」、「我們都被錢壓死了」,21 世紀在奇美部落的許多場合，我會聽到這樣的話語。但是，奇美部落族人參與發展轉型的方式是跟著別人的屁股後面跑，聽盤商或糧商的老闆怎麼說,農藥行老闆怎麼說,種苗行老闆怎麼說,別的部落的親戚怎麼說.....,常常在發展結構中會剝削他們的人卻成為他們重要的消息來源和轉譯者。奇美部落族人熱烈想要參與發展，但卻完全不符合發展機制的運作要求，他們沒有資本、不懂科學技術、討厭官僚主義、也離經濟理性的運作相距甚遠。但他們會依恃自己的「原住民價值系統」,做為自己群體的基礎設施,參與在發展轉型裡面。可以說，奇美部落居民在戰後工業化發展轉型的過程，是在各種國家制度的確立、政策的推動和資本主義力量滲透影響下，選擇「主動參與」。

台灣原住民這種主動參與國家發展轉型的現象，與 Tania Li 對某些地方「資本主義關係的進入是隱形的」的觀察不謀而合。不同於全世界許多以鄉村生計為重點的當代社會運動，抗議跨國公司的土地掠奪與生產壟斷行為，居民團結起來保護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維護環境的可持續性。相反的，在這些地方資本主義關係以一種不急不緩的結構性樣式存在和發生著，沒有戲劇性的侵占與抵抗[21]。盡管奇美部落族人明明處於結構不利位置，為什麼會願意被「奴化」（奇美部落 Olo'h Komud 用語），沒有任何

[21] Tania Murray Li, *Land's End: Capitalist Relations on an Indigenous Frontier.*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4): 8.

國家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抵抗，反而想要「主動參與」？或許這要放在當時台灣政府推動發展轉型的歷史脈絡下來理解。下一節，我將透過技術政治分析，探究二戰後至 1980 年代中期，台灣國家推動發展轉型的方法與重要特徵。

肆、讓原住民價值系統不可見的技術政治

二戰後台灣作為後進發展型國家，基礎設施由國家主導建設，主要目標是用於追求經濟發展和改善產業發展的瓶頸，而非用於公共服務和改善城鄉差距。同時，中華民國作為現代國家統治其實越來越需要建立各種社會技術系統，並且與特定形式的國家權力結合。基礎設施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因而建立，透過技術與物質基礎設施的控制與調節來影響人口行為，包括穩定物價、確保糧食、公共衛生、街道照明、自來水與電力系統、橋樑道路建設.....等。

當時在國民黨國共內戰節節戰敗退守台灣的歷史脈絡，以及韓戰後地緣政治的機緣影響，中華民國發展成為威權國家。威權國家掌有主要的資源，利用「恩庇-侍從」的上下利益交換關係來維持政權的穩定。其中包括黨國以特許資源和基礎設施籠絡地方派系，再形成恩庇式政商網絡，並將地方派系的政治勢力侷限於地方。學者將此特徵稱之為「國家資本主義」和「黨國侍從體系」[22]。

技術系統在現代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所需要的社會運作方式也越來越要求科學理性與效率管理。在此脈絡下，一種依據科學管理和專業分工的現代行政方式（一般稱之為文官系統），與相應於此文官系統需要的社會性基礎設施，逐漸被發展成形[23]。技術基礎設施、行政專家與政治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在戰後台灣國家生存與經濟發展的歷史中非常明顯。

---

[22] 參見王振寰、李宗榮、陳琮淵，〈台灣經濟發展中的國家角色：歷史回顧與理論展望〉，收錄於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7），49–88。黃崇憲，〈利維坦的生成與傾頹——台灣國家研究範例的批判性回顧，1945-2005〉，見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群學，2008），321–392。

[23] 參見 Andreas Folkers,. “Existential Provisions: The Technopolitics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 Space.* 與 Chandra Mukerji, “The Territorial State as a Figured World of Power: Strategics, Logistics, and Impersonal Rule.” *Sociological Theory.* 和 Michael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戰後國際冷戰和兩岸分治的現實背景下，台灣實施長期的動員戡亂體制與戒嚴，國家機器擁有強大的政治支配權力。但同時也授權一批懷抱著現代理性與工業救國共識的西化技術官僚，以超部會任務編組的方式，讓他們擁有很大的專業自主權，去推動一系列土地改革、基礎建設、財經與產業政策，促進戰後台灣快速的經濟發展，讓國民政府得以用經濟穩定政局[24]。

管理的概念和結合法律、制度、所有權、科學等機制，鑲嵌於國家主權統治體系之中的實踐，對經歷日治、國民政府兩次不同政權殖民的台灣原住民族影響重大。事實上，日本在台灣的統治，是第一次國家治理配合近代科學知識來運作，也因而第一次國家官僚可以越過中間團體直接統治地方社會與一般人民。台灣原住民的土地，也是在日本殖民政府武力鎮壓各地區原住民族後，以新式的統治技術掠奪。一方面透過林野調查、人口調查、土地測量、登記、造冊、管控……等，讓國家更容易辨認原住民族的領域[25]。與此同時，以調查、規劃、登記之名，大幅限縮原住民土地的使用空間，沒收和掠奪大面積原住民族土地和自然資源列入公有地。其中，再釋出部分公有地（其實是原住民族土地）給日本資本家發展工業產業或移民村。另一方面，則透過水圳與水田化、集團移住、學校教育、交易所……等政策推動和制度建立，改變原住民原本的生產模式、社會結構與權力關係，透過法律和制度將原住民社會逐漸資本主義化[26]。

1945 年政權交替之後，大面積公有地所有權都被移轉給國民政府——連同使用公有地的日資工業產業和移民村，以及基礎設施、菸酒樟腦等專賣事業。國民政府接收以後，關於所接收的公有地是基於對原住民土地的剝奪、竊盜與種族滅絕的過程就無法再被提及。一方面是因為 1945 年對日接收後，很快就發生二二八事件（1947 年）、國共內戰國民黨敗退台灣、動員戡亂體制（1948 年）與戒嚴體制（1949 年）的實施，以及造成四十年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24] 參見瞿宛文，《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2017）。王振寰、李宗榮、陳琮淵，〈台灣經濟發展中的國家角色：歷史回顧與理論展望〉，收錄於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

[25]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26] 巴克萊（Paul D. Barclay）；堯嘉寧譯，《帝國棄民：日本在臺灣「蕃界」內的統治（1874-1945）》（Outcasts of Empire: Japan’s Rule on Taiwan’s “Savage Border,” 1874-1945）（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2018]）。詹素娟，《典藏台灣史（二）台灣原住民史》（台北：玉山社，2019）。

高壓統治與白色恐怖的狀態[27]。要求原住民族自治和主張還我土地的原住民菁英被羅織罪名槍斃，形成對原住民的威嚇與禁聲效應。另一方面，因為一種包裹和鑲嵌於國家統治體系的「管理系統」，結合法律、制度、所有權、科學等機制，所形成的統治技術與制度結構，讓原住民土地的被剝奪與殖民歷史的不正義被隱匿而變得不可見。

同樣被隱匿與被秘密鑲嵌於這套「管理系統」的，還包括原住民主權、價值系統與本體論[28]。這套科學治理的「管理系統」，是以精準的理性計算、強調書面紀錄、和私有財產權的制度和邏輯在運行。和原住民族原本並非私有制的土地法則，以及立基於互惠交換的人際關係與倫理法則，是完全不同的。國家統治體系的「管理系統」是同時結合法律、制度在運作。公務員「依法行政」，凡是不符合「管理系統」邏輯的，在國家體制面前連爭辯的餘地都沒有。21 世紀的今日，奇美部落內部還是有許多土地糾紛和繼承爭議。例如，當初土地登記在家族成員 A 的名下，在私有制的法律制度下，土地就變成 A 個人的。但傳統阿美族人的土地概念是「家族財產共有制」，所有居住在同一家屋裡的人對土地、財產都有權利。經過一、兩個世代之後，由於家族內部各種摩擦和紛爭，且對財產觀念的逐漸改變，A 的後代已經不願意平白將土地分給其他親戚。當初土地登記時，許多族人並不清楚登記下去就是以完全不同的制度在認定土地。直到現在，還會有族人會為了土地的爭議跑去找村長告狀，村長也很無奈。確實依照以前阿美族人對土地、財產的觀念，告狀的人有他的道理，但無奈，現今的法律制度是站在告狀者的年輕親戚那邊。這些土地紛爭顯示，當初土地登記轉換為私有制，是在阿美族人還模模糊糊的狀態下就轉變了。原住民不但對私有財產制度陌生，也對科學治理的「管理系統」陌生，直到今日依然有許多原住民不太馴服於這些形式理性規則和制度。許多原住民是在吃了很多虧之後，才不得不苦苦追趕、學習這些陌生的制度和資本主義運作邏輯。

日本和中華民國政府的行政規劃，都是將台灣原住民族居住區域收編到政府地方行政體系底層。在收編原住民族領域為地方的過程，原住民社會的自律性遭嚴重剝奪，又被強加統治者的邏輯、秩序和規範於原住民社會內部。另外，國家以法律將原住民重新定位為國民，展開一元式的國民

---

[27] 李筱峰、薛化元，《典藏台灣史（七）戰後台灣史》（台北：玉山社，2019）。

[28] Richard Howitt and Sandra Suchet-Pearson, *"Ontological Pluralism in Contested Cultural Landscapes,"*. in *Handbook of Cultural Geography,* ed. Kay Anderson, Mona Domosh, Steve Pile and Nigel Thrift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03): 557–69.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形塑工程。山地施政要點、山地三大運動（生活改進、定耕農業、林班造林）、山地平地化政策，再再以改善原住民經濟生活的名義，促使原住民與大社會合流和同化。原住民的傳統語言、文化與生活方式遭受前所未有的衝擊。在這整個過程中，原住民社會越來越資本主義化，但經濟和政治社會地位卻陷入結構不利位置。且原住民族被納入地方行政體系的界線區分，也持續裂解和消除原住民族的各種群體意識[29]。

二戰後歐美已發展國家追求基礎設施的公共服務目標，和同時期作為後進發展型國家的台灣很不相同。戰後歐美國家明確意識到，隨著人們越來越依賴公共基礎設施，基礎設施的供應和服務必須力求平均分配，以消除不同地區與城市之間的空間差異。而且基礎設施作為一種技術政治，不僅是用來作為保護赤裸生命的先決條件，而且應該更普遍的提高福利和生活品質。簡言之，二戰後歐美國家透過基礎設施在整個國家建立平等的生活條件，來補充和維持個人自由，從而實現自由的權利[30]。

戰後台灣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是要改善產業發展的瓶頸，提供有利於產業發展的外部條件，尤其重視交通設施與水、電、能源的穩定供應。不過戰後台灣快速的工業化與經濟發展並沒有造成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一般歸因為 1950 年代初期土地改革的成功，使得地主階級在台灣社會中幾乎消失，經濟發展的成果廣施眾人，實質減少貧窮與收入不平等的情形[31]。但基礎設施的技術政治影響從來是深刻、複雜和非工具性的[32]。戰後台灣接收日本基礎設施撥歸公營，並透過立法、政府控制和公用事業所有權來主導基礎設施的營運和發展。雖然這是以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但相當程度也解決並保障了國民基本生活需要。雖然逐漸達成基礎設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29] 松岡格、周俊宇譯，《「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台湾原住民社会の地方化——マイノリティの 20 世紀）（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2012]）；詹素娟，《典藏台灣史（二）台灣原住民史》。

[30] Andreas Folkers, “Existential Provisions: The Technopolitics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 Space.*

[31] 參見陳添壽，《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資本主義與市場篇》（台北：元華文創，2017）；Cal Clark , and Tan Alexander C.. *Taiwan’s Political Economy: Meeting Challenges, Pursuing Progress.*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1).

[32] Emiliano Treré and Alejandro Barranquero Carretero, “Tracing the Roots of Technopolitics: Towards a North-South Dialogue,” in *Networks, Movements and Techno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Critical Analysis and Current Challenges,* ed. Francisco Sierra Caballero and Tommaso Gravante (Cham: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8): 43–63.

施普遍化的方式，也與 1950 年代以後開放地方性選舉並與「黨國侍從體系」結合，偏重水、電、公路設施。

由於資本主義不均衡地理發展的現象[33]，處於發展邊陲的原住民地區，基礎設施的建設也比其他地區來得慢[34]，甚至長期被排除在國家基礎建設計畫之外[35]。而原住民參與台灣經濟發展的方式，也是透過道路基礎設施及伴隨基礎設施而來的「進步」想像[36]，將原住民快速帶離原鄉，成為都市的勞動力，轉換成現金，再購買商品（家電、住房、各種工業產品、消費物品.....）回來部落，改善物質生活，構成對所謂「進步」的想像與欲求。

上述戰後台灣經濟轉型的成果，實質上是建立在剝奪原住民土地的殖民歷史不正義基礎之上，但普遍並不被台灣人民（包括原住民自己）所意識。無論是透過硬體基礎設施或是相對應於國家科學管理的軟體基礎設施，台灣經濟發展的效應還是影響和改善了原住民的物質生活，盡管過程中原住民付出的各種代價是痛苦的。原住民原本的價值系統本體論，普遍不被主流社會認知，甚至認為應該要被同化消滅。但無論是二戰之後，甚至是 21 世紀的今天，還是有許多原住民群體保留其價值系統與人際關係。甚至原住民群體在遭遇台灣經濟發展體制下的困境，還會依恃自己原本的價值系統，以自己熟悉的方式在新的社會情境下，挪用新的技術來解決。下一節二戰後至 1980 年代中期，奇美部落的秀姑巒溪船運就是典型的例子。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33] David Harvey, *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2005).

[34] 例如奇美部落很晚才有水、電、電話和部落聯外道路。以經濟發展的角度觀之，東台灣是台灣開發相對較晚的地方，位於海岸山脈裡頭的奇美部落又更晚。

[35] 例如，山區原住民部落的自來水與水圳灌溉設施長期被排除在公共基礎建設之外，往往靠原住民自己出資拉水管，與自己組織族人維護管理。參見林靖修，〈供水系統與原住民知識：以布農族望鄉社區水資源管理研究為例〉，見范玫芳、林宗德、李河清、潘美玲、楊谷洋、駱冠宏編，《風和日麗的背後——水.科技.災難》（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230–269；林靖修，〈基礎設施、水利社會與行動者的交織：陳有蘭溪流域 Kalibuan 社區共同灌溉系統建造與營運〉，《臺灣人類學刊》第 15 卷第 2 期（2017 年 12 月）: 97–146。

[36] Brian Larki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 no. 1.

伍、挪用軍隊與資本家船運技術的原住民價值系統

二戰後政權轉換，奇美部落族人在越來越資本主義化以及納入國家行政底層治理的環境中，透過秀姑巒溪船運拉縴方式載運貨物與人員，當時奇美部落族人是如何使用和管理船隻呢？

族人每年開會推舉決定該年的船長，負責管理船隻一年，船長每年都會換人。船長必須熟悉秀姑巒溪水路，行船掌舵經驗老道。且要能指揮族人照顧好船隻，隨時視需求號召族人搬運船隻，尤其要預防颱風天船隻被高漲的溪水流走。圖 5 是 1956 年瑞穗鄉公所購買給奇美部落族人使用的木製船隻「勝利號」。根據奇美族人的說法，當時是在奇美民選村長（奇美部落在中華民國的行政劃分為奇美村）的請求下，瑞穗鄉公所體恤奇美族人以稻穀納稅與貿易農產品運送不便，買給奇美村民共同使用的[37]。

圖 3：奇美部落共有船隻勝利號，1956 年進水典禮合影。

[37] 根據奇美部落老人家的說法，1956 年勝利號之前也曾有別的船隻，但後來遭遇颱風被秀姑巒溪大水沖走。中斷了好幾年沒有船，奇美部落族人只能用人力搬運農作物到瑞穗。至於 1956 年之前的船隻是日本政府或日資資本家留下來的船？還是二戰後中華民國政府買的船？目前我還沒有問到確切的答案。但奇美老人家很肯定地說，二戰後到 1956 年的木船，就是靠奇美部落用家族 Mipaliw（換工）和船長輪值方式在運行。

資料來源：奇美部落前頭目 Mayaw（鄭光亮）提供。

木船每趟可載 20 包的稻穀（一包 60 公斤）。拉船的人員，是運送稻穀的家族以 Mipaliw（換工）的方式和其他家族合作，由各家族出工的人力。木船的板子接縫難免會漏水，當時奇美部落有會建造和修補船隻的族人[38]，以石灰混合麻布袋等物質填充修補漏水縫隙。運送農作物時，會叫一個家族的小孩（還會特別選身材矮小體重較輕的小孩）在船上，專門負責用木製畚箕舀水（直到 1980 年代，塑膠在奇美部落還是珍稀之物[39]）。圖 6 至圖 9 是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在奇美村擔任村幹事的陳銘義提供的。當時陳銘義每個禮拜都要走三、四個小時的山路進來奇美部落辦公。這四張相片是當時鄉公所請奇美部落的居民幫忙拉木船走水路運送東西到瑞穗，只有三個人拉，算是很小規模。陳銘義用自己的相機記錄下當時的畫面。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38] 這位會建造船隻的族人是日治時期習得造船技術，曾收徒弟跟著他學習造船、修船，但他教導徒弟會留一手。有一次徒弟跟著他學造船，就在快完成、進行船尾的建造之時，他忽然差遣徒弟去拿工具。等到徒弟拿了工具回來時，最困難、有關鍵技術的船尾已經做好了。

[39] 儘管 1960-1980 年代，台灣工業發展的石化加工品（紡織、塑膠、玩具等）已經行銷世界並充斥內需市場，但奇美部落在車輛能行駛的部落聯外道路開通之前，塑膠製品仍然很稀有，形成與一般台灣社會物質生活上的落差。奇美部落婦女 Panay（假名）告訴我，1980 年代她拿著家裡唯一一個塑膠臉盆到秀姑巒溪河邊洗衣服，結果不小心讓塑膠臉盆沈入溪底。她急著跳入秀姑巒溪潛水，試著要將那個塑膠臉盆救上來，結果試了多次都沒辦法，在岸邊急得快哭了。因為那時候塑膠臉盆在奇美部落是珍稀之物，要很珍惜的使用，弄丟了她不知道回家要如何跟家裡人交代。後來部落青年 Tamod 剛好到秀姑巒溪要過河到對岸田園，男生潛水較深且水性較好，幫助 Panay 將塑膠臉盆拿上來。當時奇美部落族人彼此都非常深刻理解物質生活的困難，會無條件的彼此幫忙生活中遇到的問題。當然，這也是阿美族價值系統的一部份，族人懷抱感激的心情會以另外的方式還給對方。

圖 4：奇美部落族人以拉縴的方式拉船。

資料來源：陳銘義提供。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圖 5：船長在木船後方掌舵。

資料來源：陳銘義提供。

圖 6：拉船到半路，河邊吃午餐。

資料來源：陳銘義提供。

國立臺灣圖書館

圖 7：行船中的船頭。

說明：副船長在船頭用竹竿撐船，竹竿末端套上鐵製尖銳物方便插入溪底使力，或者行進中的船即將撞到大石將船推離大石。另一人以木製畚箕舀水，清除船

中滲入的積水。

資料來源：陳銘義提供。

圖 8：二戰後至 1980 年代中期，奇美部落秀姑巒溪船運相關地點。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資料來源：吳明季繪圖。

木船在奇美部落主要有兩種載運功能。一種是載運人或物品橫渡秀姑巒溪到部落對岸的田園（見圖 10，亦即從 Lanar 的船出發處，到 Tarali 過河田地的過河上岸處），所以每天都會使用船隻。那時候幾乎每個奇美男人都會划船，老人家說：「因為年輕人喜歡玩嘛」。這是典型的阿美族人學習方式，年輕人長期觀察老人家如何操作和照顧船隻，有樣學樣在玩樂中摸索、學習划船技術和船隻的使用，有點心得或困惑再去請教老人。老人在日常生活也會觀察年輕人如何操作船隻，並給予指導[40]。早上差不多 6 點到 8 點族人陸續來到河邊，分批由會划船的族人載運過河，形成一種默會的日常規則。先到河邊的族人聚集到一定的人數，就由某個會划船的族人載過河，有時候船剛離岸，又有剛到岸邊的族人呼喊，船還要退回去接那

[40] 年輕人喜歡玩，是還在國小的年紀就學會了撐船和掌舵。1963 年出生的 mama Mose，因為身材比較瘦小，國小四年級就被家族長輩叫上船去幫忙舀水，一起跟大人拉船運送農作物到瑞穗，並且在國小的年紀就學會了撐船橫渡秀姑巒溪到對岸。他只要撐竿兩次船就到了秀姑巒溪對岸，現在奇美部落族人都還津津樂道。

個人。船划到對岸後，划船者會交由同行另一位比較晚到的會划船族人，將船又划回對岸，接下一批的族人過河。以往沒有船隻的年代——或者船隻被颱風大水流走的年代——族人必須游泳或划竹筏過河。老人家回憶：「尤其是像這樣冬天很冷啦，很怕那個下水啊。」船隻也用來載運過河的農作物與木材回到 Lanar。1980 年代捕魚祭準備期間，Lacihak 階級還是最小階級 dep'dep'的時候，用船隻去搬他們階級在過河砍的木材。結果操作不當讓船隻破了個大洞，結果被老人家罵。這件事情奇美部落族人依舊記憶鮮明。稻穀或花生在過河田地以 Mipaliw（換工）方式採收後，年齡階級會幫忙搬到河邊，用船隻運回 Lanar，再搬到族人家裡。如果沒有船隻，是用竹筏載運過河，一次只能載兩包稻穀。那時候還沒有現在工業纖維材質的麻布袋，竹筏上裝稻穀的麻布袋容易吸水，過河之後再搬運會變得很重，人力搬運會很辛苦。使用船隻載運農作物過河，顯然是技術和效率的升級。

另外一種船隻載運功能是奇美部落和外界的物品流通。除了前述以家族換工、人力拉縴的方式載運農作物去瑞穗繳稅或販售，回程時也會載運家族所需日用品。有時候，部落漢人開的雜貨店會請回程船隻幫忙載運雜貨店要販售的商品。回程船隻在處處是急流的秀姑巒溪順流而下，如同日治時期小泉鐵形容的驚險而刺激[41]，而且載滿貨物的船隻也有翻船的風險。奇美部落族人回憶有一次載雜貨店商品的船隻翻船後，船上的族人 Tomay（假名）第一時間跳下船潛水搶救物品，第一個目標就是去撈太白酒。然後在水裡趕快用牙齒將瓶蓋咬開，嘴巴湊上去就盡可能狠狠的喝，能喝多少算多少——這真的也要水性很好的阿美族人才做得到。Tomay 在水中喝了一大口酒，人浮出溪面呼吸一次，又假裝潛水打撈貨品，其實是潛到水裡喝酒。喝了兩大口，一整瓶太白酒就喝完了（容量是現在公賣局瓶裝料理米酒的玻璃瓶大小 0.6L）。Tomay 想的是，平常沒有錢買雜貨店的奢侈品，逮到機會當然是先喝為快。雜貨店老闆問 Tomay 怎麼沒有搶救商品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41] 小泉鐵著，黃稔惠譯，《蕃鄉風物記》（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2014[1932]），18。秀姑巒溪船運過程，1928 年被日本人小泉鐵（2014[1932]）以優美的文字記錄了下來：「探訪 Kiwit（奇密社）時，是從秀姑巒溪乘舟而去的。途中只見溪河的兩旁，盡是矗立著數百尺到數千尺不等高度的險峻斷崖。河水經過的幾處幾乎是逼近斷崖的突兀曲線，而水勢宛如射箭般的快速，這時船上的遊客生命安危全賴船夫的操船技術，雖然心中有些驚恐，但真的感到刺激又愉快，加上兩旁的景緻實在美麗又宏偉。雖說全程只有三里（約 12 公里）長的距離，但還是花了四十分鐘才到達奇密社的斷崖下。」

岸，Tomay 裝無辜說：「不知道，沒有找到。」但說這話的時候因為喝酒整個臉紅紅。每次奇美人唱作俱佳邊說邊表演當時翻船 Tomay 搶救商品的事蹟，所有在場的族人都會笑到肚子痛。

除了雜貨店的商品，船隻也幫教會、鄉公所、奇美國小和派出所載運物資和水泥進來部落。在奇美部落族人普遍都還住在茅草屋的年代，就興建了水泥的教堂（見圖 11）、活動中心、學校教室和派出所。這些水泥建物陸續從 1960 年代中期到 1980 年代中期興建完成。蓋這些水泥建築，都是依靠木船和奇美部落族人拉縴。上岸後以人力搬運一包包的水泥，依照神父或包商的設計圖，以 Marara（義務勞動）的方式輪流出工，用人力攪拌水泥、灌漿完成水泥房舍的興建。奇美國小的籃球架與籃球場的水泥是 1980 年代初期船運載進來的，小朋友還到河邊幫忙搬籃球架，並且撿河邊的石頭丟到教導主任的鐵牛車上——大人以人力做水泥籃球場之前，需要先鋪設小朋友從河邊撿的鵝卵石。族人實際用勞力參與興建水泥建築，建構了奇美部落族人對現代生活的想像。1980 年代奇美族人形成一股到都市工作的風潮，最主要的想望就是要賺錢回部落蓋水泥房子，揮別颱風夜在茅草屋裡睡覺忽然屋頂被吹掀的驚恐記憶。

國家臺灣圖書館

圖 9：2012 年奇美天主堂慶祝建堂 46 週年邀請卡

說明：1954 年天主教傳入奇美部落，最早的教堂是蓋茅草屋。幾次颱風吹垮後，由法國神父設計、募款、出資，教友出力改建水泥教堂。一包包粉狀水泥從瑞

穗以船隻載運至部落，神父教導教友自己攪拌水泥用模型灌製空心磚。然後砌成教堂的牆壁。1966 年水泥教堂落成。圖為 2012 年奇美天主堂慶祝建堂 46 週年的邀請卡。

資料來源：邀請卡是吳明季製作，奇美天主堂老相片是時任奇美村幹事陳銘義拍攝提供。

以往用拉縴船運方式將農作物運送到瑞穗之前，運送農作物的家族會事先派家中成員徒步下山與盤商聯繫。事先跟盤商約定好時間，駕牛車到拉船上岸的定點載運農作物。拉船的過程會用到大量奇美部落族人長年累積的知識。圖 10 可以看到拉船到瑞穗有兩個上岸處——牛山上岸處與瑞良上岸處。適合在牛山還是瑞良上岸，要看季節和河道的變化——秀姑巒溪河道每年都會因颱風而改變。聯絡盤商的家族成員會在下山的途中看水路，判斷要聯絡盤商在哪裡會合。

行船從奇美到瑞穗會經過七個大的急流，其中最大的急流是 Kaalolan no waco（流狗灘）[42]（見圖 10），1933 年毛利之俊在《東台灣展望》[43]也特別記錄了這個急流並拍下相片（圖 12）。老人家說拉船到 Kaalolan no waco 之前要靠岸，將船上的農作物都搬下來，人力搬運農作物走陸路越過急流再上船。滿船的農作物太重也太危險，是無法拉過這個急流的。另外，行船到 Lolod no fasolan（捲浪）這個地方，要小心絕對不能將船划進那個水灣，因為一旦划進去就沒有辦法划出來了。Lolod no fasolan 這個名稱的意思是，這個水灣做大水時會起捲浪，那個浪就像阿美族人編織的 fasolan（大籐席）一樣會捲起來。此處的漩渦、暗流、水流與浪的力量，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千萬要謙卑、戒慎、小心。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42] 從前有一個老人帶著他的狗從這個急流（現在秀姑巒溪泛舟的旅遊宣傳稱之為第七急流）的上游游泳渡河，要到對岸的田園工作。結果老人游過去了，但狗下水的地點不夠遠離急流，竟然被急流流走了。意思是連狗這麼會游泳的動物，都無法游過這個急流，所以叫做 Kaalolan no waco（流狗灘）。

[43] 毛利之俊，《東台灣展望》（東台灣曉聲會，1933）。

圖 10：Kaalolan no waco 流狗攤，經過此急流時全船客人和貨物都要下船。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資料來源：毛利之俊《東台灣展望》。

從奇美拉船到瑞穗至少要 3、4 個小時，通常為了避開夏天炎熱的太陽[44]，早上六點就出發了。拉船是很辛苦的工作，拉船的人在半路一定要吃飯補充體力。載運農作物的家族會為船長、副船長和幫忙拉船的換工者準備 Hakhak（糯米飯）和 Silaw（醃肉）等食物。通常拉船者也會在半路撒網捕魚，就地找山泉水生火煮魚——奇美人不會直接喝秀姑巒溪的溪水，他們熟悉地形，知道到哪裡找乾淨的山泉水。奇美部落族人對於秀姑巒溪的水路、魚棲息的習性與沿路領域都非常親近熟悉。當我問：「每次拉船時，撒網都會有魚嗎？」得到的答案是自信的：「當然，幾乎都會有啦。」但其實是對於在哪個季節、哪個時間點、在哪個河段的深潭或急流邊會有魚的

[44] 在奇美部落，冬季的農作物採收期，因農作物種植與成長過程會面臨颱風等不確定因素，種得較少，主要是種植作為下一期的種子。作為經濟作物販售的稻穀或花生多在夏季採收期收穫。

知識，他們已經非常熟稔並且經驗老道。哪裡找乾淨水源煮魚，對奇美人也是小事一件，Lasaysay（滴滴答答的小瀑布，這裡的水很甘甜）就是著名的取水地之一。

奇美部落族人對秀姑巒溪地理和水文環境的熟悉，對魚類和自然生態的親近理解，得力於奇美部落價值系統於生活中的持續運作。包括 10 歲左右，爸爸就會帶著小男孩在秀姑巒溪學習抓魚。13 歲加入年齡階級，階級訓練時常就在秀姑巒溪各個領域。家族婚喪喜慶或部落大小事務，一定要 Pakelang 抓魚、煮魚做為結束，否則族人會沒有結束的感覺，心裡會難受有疙瘩。包括每年的 Komolis（捕魚祭），是奇美部落年齡階級訓練最為辛苦、嚴格的時刻，光是捕魚祭祭典準備工作，四級以下年輕人就要準備一、兩個月。透過交換文化與祭典儀式，奇美部落族人不斷實踐和鞏固自己的價值系統。也因如此，當奇美部落得到地方政府購買的木船，很快就能以自己價值系統的社會制度、人際網絡和運作邏輯組織起來。也很快能夠運用自己對秀姑巒溪環境熟悉的各種知識，以及發揮異質連結的創造力，挪用族人從 1870 年代中期至二戰之前，就看過的清國軍隊與日本資本家的秀姑巒溪船運技術。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非常矛盾弔詭的，奇美部落秀姑巒溪船運基礎設施，由於不斷以原住民價值系統為社會性基礎設施來運作，因而一方面也不斷鞏固和具體化自己原住民價值系統的權力佈局。但另一方面，此基礎設施同時又在更大的尺度上為組織市場和國家治理服務。在更為霸權的國家治理和資本主義權力佈局下，此船運基礎設施的技術政治造成權力的滲透與影響是錯綜複雜的。以原住民價值系統運作的秀姑巒溪船運，協助了資本主義市場的貨物和觀念流通，強化了國家恩庇侍從體系，也造成了反政治[45]的效果。而所有這些技術政治的綜合效果，反過來勾引奇美部落族人對物質生活的慾望，甚至漸漸危害到自己原住民價值系統的根基。

[45] James Ferguson,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Cambridge: CUP Archive, 1990).

圖 11：奇美部落拉船木雕與船槳。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說明：木雕前面的船槳是古董，是當初的船長之一 Pahaw 留下來的槳。拉船木雕是奇美部落文化發展協會提供田調故事，由港口部落阿美族藝術家達耐・達立夫的團隊完成藝術創作。

資料來源：吳明季拍攝。

圖 12：日治時期行船在秀姑巒溪的情形。

資料來源：毛利之俊《東台灣展望》。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陸、結論

Brian Larkin[46]指出基礎設施是創造其他客體/對象/物體（objects）得以運行的基底物件（objects），而且當它們這樣做時，它們是作為系統在運行。基礎設施的本體論獨特之處在於，它本身是事物，有物體的物質基礎，但同時作為系統運行也必定是事物（things）之間的關係。二戰後的奇美部落秀姑巒溪船運，在台灣當時時空形成了促進了貨物、人和想法流通的基礎設施，但其構成的流通體系結構非常特殊。

首先，這是因應二戰後中華民國國家主權一年兩期稻穀實物納稅的政策，由地方政府出錢購買的船隻，但船隻的運作與管理仰仗的不是國家機構，而是由奇美部落原住民價值系統來運作。中華民國國家體系是將奇美部落納入國家行政體系的最底層來看待，但若依照國家行政體系的運作方式與官僚邏輯，秀姑巒溪船運其實難以運行。亦即，地方政府實無能力經營管理船隻的運作。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對原住民——當時稱山地同胞——

[46] Brian Larki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 no. 1.

施行同化政策，認為原住民的文化和經濟是落伍、不文明的，必須要山地平地化改善山胞生活。然而恰恰是奇美部落族人被同化得有點失敗，依然維繫著自身原住民價值系統，且原住民價值系統維繫得越好，秀姑巒溪船運才能運行得越好。

其次，秀姑巒溪船運基礎設施促進原住民價值系統——包括族人依然採用阿美族 Mipaliw（換工）模式種植市場需要的經濟作物，以及船運基礎設施的運作本身——與資本主義系統的連結與流通，一般會用 articulation（連結表現）理論來解釋。articulation 概念最早源自馬克思《資本論》，之後受新馬克思主義和依賴理論的影響，認為人類社會往往同時有好幾種生產模式連結在一起，且這幾種生產模式之間存在著不平等的關係。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有能力吸納原住民社會的生產模式，且利用原住民生產模式儲備「勞動後備軍」。雖然 articulation 對當代原住民經濟現象有很強的解釋力，但晚近受到新的理論發展影響，articulation 理論概念也受到修正。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第一個修正是，articulation 並不是一個中立的概念，涉及政治經濟學關注的權力和鬥爭。在台灣原住民族經歷資本主義化的脈絡中，殖民暴力、新的統治技術與制度的強制改變，都是不能忽視的歷史事實。在全球的尺度，「資本主義體系」與「原住民價值系統」的 articulation 並非自然，涉及殖民剝削、侵占原住民的土地與奴隸勞動力/奴工契約工的使用，並以此完成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與其全球體制建立[47]。我對 articulation 理論概念的批判，在於在此理論發展脈絡下，很難看到「原住民價值系統」的本體論與能動性，限制了可以探討的內容。這個理論以資本主義為經濟發展階段的制高點，會在論證過程中不斷賦權與鞏固資本主義體系，邊緣化原住民價值系統。

第二個修正是，原住民價值系統並不是某種古老的殘餘物，不是某種靜態的系統。二戰後挪用清國的軍隊與日治時期資本家的技術，但卻以原住民價值系統運作的秀姑巒溪船運。讓我看到奇美部落族人，因為異質連結與系統連結所產生的驚人創造力——原住民的價值系統可以連結新的

---

[47] 貝克特（Sven Beckert）著；林添貴譯，《棉花帝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去與未來》（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台北：天下文化，2017[2014]）；米尼奧羅（Walter D Mignolo）；王嘉蘭、周俊男、唐慧宇、黃杰譯，《解殖：全球殖民性與世界失序》（Global Coloniality and the World Disorder: A Decolonial Take）（新竹：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1）。

技術，以解決原住民部落在當時環境所面臨的困境。原住民價值系統並不是某種靜態、不會變通的東西。這樣的創造，是原住民價值系統與資本主義體系在特定的時空脈絡，多方力量鬥爭角力下，形成新的經濟系統混種物。這挑戰了現代西方知識生產對原住民經濟系統遭遇資本主義必然會解體轉型的預設。

第三，矛盾弔詭的，以原住民價值系統為社會性基礎設施來運作的秀姑巒溪船運，其技術政治會鞏固原住民價值系統的權力佈局，但同時也會漸漸削弱原住民價值系統的根基。在更大的尺度，與更霸權的權力關係上，秀姑巒溪船運基礎設施協助資本主義商品貨物流通。也因為是國家出資購買，強化了恩庇侍從體系，也制約族人對國家的態度，造成了反政治。基礎設施的技術物質運作，會被不同的行動者（包含人與非人）為了多重且往往是相反的目的而挪用或抵制，結果從來不是能預先設定的。重點在於基礎設施如何與某種（或多種）權力佈局形成客觀的連結，而達成治理生命的權力佈局效果。這些權力關係如何在基礎設施中具體化，社會技術網絡為了運轉基礎設施，如何產生特定形式的「環境性」。基礎設施並不決定具體的行動方針，而是透過改變（建構成的）環境來修改社會運作的「可能性領域」。基礎設施的技術政治造成權力的滲透與影響從來都是錯綜複雜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徵引文獻

一、中文參考文獻

王振寰、李宗榮、陳琮淵，〈台灣經濟發展中的國家角色：歷史回顧與理論展望〉，收錄於李宗榮、林宗弘編，《未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7，49–88。

吳明季，〈日治與清國時期的秀姑巒溪船運〉，《原住民族文獻》第 52 期（2022 年 9 月），94-97。

吳明季，《價值、參與和主權：台灣原住民部落發展實踐的三個面向》。花蓮：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博士論文，2022。

李宜憲，〈晚清國家體制與原住民部落的衝突：從烏漏社到阿棉山社〉，收錄於蔡中涵編，《大港口事件論文集》（花蓮：台灣原住民教授學會，2008），1-32。

李宜憲、莊雅仲，《大港口事件》。原住民族重大歷史事件系列叢書(四)。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

李筱峰、薛化元，《典藏台灣史（七）戰後台灣史》。台北：玉山社，2019。

官大偉，〈台灣國家主權、治理與多元族群的互動〉，收錄於林秀幸、吳叡人主編，《主權獨立的人間條件：台灣如何成為一個自由平等、團結永續的新國家？》。台北：經濟民主連合，2020，319–357。

林文玲，〈基礎設施研究：前言〉，《臺灣人類學刊》第 15 卷第 2 期（2017 年 12 月），1–6。

林靖修，〈供水系統與原住民知識：以布農族望鄉社區水資源管理研究為例〉，見范玫芳、林宗德、李河清、潘美玲、楊谷洋、駱冠宏編，《風和日麗的背後——水.科技.災難》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230–269。

林靖修，〈基礎設施、水利社會與行動者的交織：陳有蘭溪流域 Kalibuan 社區共同灌溉系統建造與營運〉《臺灣人類學刊》第 15 卷第 2 期（2017 年 12 月），97–146。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夏黎明、林玉茹、黃宣衛，〈國家內部次區域發展：東台灣的論述與經驗〉，收錄於簡旭伸、王振寰編，《發展研究與當代臺灣社會》。高雄：巨流，2016，102。

陳添壽，《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資本主義與市場篇》。台北：元華文創，2017。

黃崇憲，〈利維坦的生成與傾頹——台灣國家研究範例的批判性回顧，1945-2005〉，見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群學，2008，321–392。

張家綸、康芸甯、林佩欣，〈大圳誕生之前的故事〉，收錄於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編，《圳流百年：嘉南大圳的過去與未來 真正改變臺灣這塊土地的現在進行式》。台北：方寸文創，2020，33–53。

詹素娟，《典藏台灣史（二）台灣原住民史》。台北：玉山社，2019。

廖運潘，《茶金歲月：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新北市：聯經出版公司，2021。

鍾怡婷，〈農村：現代性未竟之處？還是社會創新的苗床？〉，《巷仔口社會學》台灣社會學會，2019 年 3 月 26 日，https://twstreetcorner.org/2019/03/26/chungyiting/。

蕭全政，《臺灣政治經濟學：如何面對全球化與中美海陸爭霸的衝擊？》。台北：時報出版，2020。

瞿宛文，《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2017。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二、外文參考文獻

小泉鐵著，；黃稔惠譯，《蕃鄉風物記》（新北市：原住民族委員會，2014[1932]），18。

巴克萊（Paul D. Barclay）Barclay, Paul D. ；堯嘉寧譯，《帝國棄民：日本在臺灣「蕃界」內的統治（1874-1945）》（Outcasts of Empire: Japan’s Rule on Taiwan’s “Savage Border,” 1874-1945）。（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0[2018]）。

毛利之俊，《東台灣展望》（東台灣曉聲會，1933）。

布洛薩（Alain Brossat, Alain.）；莊浚生譯，〈裝備將是集體與否？〉（Les Équipements Seront Collectifs Ou Ne Seront Pas）莊浚生譯。《中國文

哲研究通訊》第 30 卷第 (2)期（ (2020[2019].年 6 月）.) : ，149–158。

布洛薩（Brossat, Alain）.；謝承叡、韓旻奇、羅惠珍譯，《遭撞翻的哲學家：哲學評論集》（Le Philosophe Renversé: Et Autres Essais）謝承叡、韓旻奇、羅惠珍譯。（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1[2019]）。

米尼奧羅（Walter D Mignolo, Walter D）；，王嘉蘭、周俊男、唐慧宇、黃杰譯，《解殖：全球殖民性與世界失序》（Global Coloniality and the World Disorder: A Decolonial Take）。（新竹：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1）。

貝克特（Sven Beckert, Sven）；，林添貴譯，《棉花帝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去與未來》（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台北：天下文化，2017[2014]）。

松岡格、，周俊宇譯，《「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 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台湾原住民社会の地方化――マイノリティの 20 世紀）（台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2012]）。

Barrett, Richard E., and Martin King Whyte. , 1982. “Dependency Theory and Taiwan: Analysis of a Deviant Cas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no.(5): 1064–89.

Carse, Ashley. *Beyond the Big Ditch: Politics, Ecology, and Infrastructure at the Panama Canal*. (Cambridge : The MIT Press, 2014).

Chu, Huahsuan. “Tropicalizing Taiwan : The Environment, Crop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Japaness Colonial Food Regime, 1895-1945.”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he Graduate School of Binghamton University, 2020).

Clark, Cal, and Alexander C. Tan. *Taiwan’s Political Economy: Meeting Challenges, Pursuing Progress.* (Boulder and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1).

Descola, Philippe. “Modes of Being and Forms of Predication.” *HAU: Journal of Ethnographic Theory* 4 no.(1) (Summer 2014. Summer.) : 271–280.

Ferguson, James.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Cambridge : CUP Archive, 1990).

國家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Folkers, Andreas. “Existential Provisions: The Technopolitics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 Space* 35 no.*(5)* (October 2017.10.) : 855–874.

Golub, Alex. *Leviathans at the Gold Mine: Creating Indigenous and Corporate Actors in Papua New Guine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162.

Graeber, David. *Toward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The False Coin of Our Own Dreams.* Springer, . (2001).

Harvey, David. 2005. *Spaces of Neoliberalization: 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5.

Howitt, Richard, and Sandra Suchet-Pearson. Ontological Pluralism in Contested Cultural Landscapes. In *Handbook of Cultural Geography,* edited by Kay Anderson, Mona Domosh, Steve Pile and Nigel Thrift.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2003) : 557–69.

Ka, Chih-Ming, and Mark Selden. 1986. “Original Accumulation, Equity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s of Socialist China and Capitalist Taiwan.” *World Development* 14 (no. 10): 1293–1310.

Larkin, Bria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 no. *(1)* (August 2013.8) : 327–43.

Li, Tania Murray. *Land's End: Capitalist Relations on an Indigenous Frontier.* Duke University Pres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4) : 8.

Luque-Ayala, Andrés, and Simon Marvin. “The Maintenance of Urban Circulation: An Operational Logic of Infrastructural Control.”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 Space* 34 no.(2) (April 2016.4.) : 191–208.

Mann, Michael.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5 no.*(2)* (November 1984.11.) : 185–213.

Mukerji, Chandra. “The Territorial State as a Figured World of Power: Strategics, Logistics, and Impersonal Rule.” *Sociological Theory* 28 no. *(4)* (November 2010.11.) : 402–24.

Scott, James C. *Seeing like a State :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Treré, Emiliano, and Alejandro Barranquero Carretero. “Tracing the Roots of Technopolitics: Towards a North-South Dialogue.” In *Networks, Movements and Techno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Critical Analysis and Current Challenges*, edited by Francisco Sierra Caballero and Tommaso Gravante., (Cham :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 2018.) , 43–63.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Postwar River Transport on the Xiuguluan River in the Kiwit Indigenous Community: The Ontology and Technopolitics of Infrastructure

Ming-chi Wu*

Abstract

From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o the mid-1980s – a period marked by Taiwan'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 a unique form of river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emerged in the Kiwit indigenous community along the Xiuguluan River. This river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operated systematically, with indigenous value systems forming the foundation of its social infra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it served larger-scale purposes aligned with the organization of capitalist markets and state governance.

This paper employs the frameworks of technopolitics and historical ethnography to analyze how the infrastructure was shaped by two distinct value systems: Indigenous values and the capitalist regime. Grounded in different ontologies, the two systems interacted, intertwined, penetrated, connected, and collided through the infrastructure's systemic functioning across multiple scales.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operation of the Xiuguluan River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was shaped by multiple configurations of power. The technopolitics of infrastructure gives rise to complex forms of power infiltration, entanglement, and influence. The technical and material operations of infrastructure are often appropriated or resisted by various actors – both human and non-human – for multiple, often opposing, purposes. The outcomes of such processes can never be predetermined. What is crucial is how infrastructure becomes objectively linked to one or more configurations of power, thereby enabling specific arrangements for the governance of life. These configurations of power continuously struggle, entangle, negotiate, and interact with one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another, generating new effects and transformations within the broader dynamics of power.

Keywords: Indigenous Value Systems, Ontology, Infrastructure, Technopolitics, Xiuguluan River Transport

國立臺灣圖書館
National Taiwan Library